

沈传经 著

福州船政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沈传经著

福州船政局

四川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邓卫中
责任编辑：蔡济生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凌志云

福州船政局

沈传经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12.875插页7 字数240千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20—00006—5/K·1

统一书号：11118·251

印数：1—2,020

定价：2.48元

前 言

自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①，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亦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要求中国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历史。要独立和民主就要富强，要富强就要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进行改革，采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才能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使中国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

鸦片战争，英国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闭关锁国大门，迫使一些有识之士，放眼看世界，寻求独立、民主和富强之策，主张引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进行改革，出现了几起发展近代工业的思潮和力量。一是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后有明显的增长，外国侵略又在客观上提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3页。

供了进一步发展到近代工业的可能，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还只是某些零星的微弱孤岛，没有具备立即发展到近代工业的条件和可能，象英国那样由工场手工业发展到近代工业。二是林则徐和魏源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制炮、造船和练兵，特别允许商民设厂造船出售，是使中国独立和富强的一幅蓝图，并对整个近代产生重大影响。可是，它在当时只溅起了几朵浪花，没有得到推行。三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编》，虽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较为完整的设想，也比林、魏主张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农民自己不能把中国引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

十九世纪后半期，是近代中国历史急剧变化的时期。

这时，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转化成为帝国主义。它对中国的侵略，亦随之由商品输出逐渐转为资本输出，由海疆深入内地，由日益深化的政治经济侵略发展成为试图瓜分中国，从而使中国社会迅速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中华民族处于帝国主义“虎视鹰瞵”；“瓜分豆剖”^①的严重危机之中。

这种急剧变化的严重局势，迫使一些人提出了进行改革的主张和办法。冯桂芬称颂林、魏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在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之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页。

下认为：对洋器能“自造、自修、自用”，就可以实现“自强”，“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否则，“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①。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正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不能“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徇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②。

在这种严重局势和中体西用思想之下，洋务派既不安于现状，又不坐以等待，让中国缓慢地走由工场手工业发展到近代工业的正规道路，而是从西方引进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先为自强创办了近代军用工业，继又以求富兴办民用企业，使中国发展近代工业走了与西方不同的道路。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开了先例，接着，一些地主、官僚，特别是商人和买办也兴办了一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此外，还有少数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成为小型的近代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这些企业，虽然情况复杂，与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而且，它与本国封建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又很微弱，但这是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

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近代社会的主要阶级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四十年代产生后

① 《校邠庐抗议》，引自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6—33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一九，第45页。

进一步壮大了，更重要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思想，不仅要求商战，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还主张设议院，改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

这些新的变化，不仅影响和制约着这一时期的历史格局，也将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洋务运动虽以经济为主，但也包括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甚至涉及外交等各个方面。它与这一时期产生的新经济、新阶级、新思想的关系极为密切，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真正的近代化运动的开端^①，亦是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开放与改革，也是当前人们重视、研究和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正确分析和评论洋务运动，不仅有利于认识洋务运动，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变化；同时，对解决中国近代史上的线索和分期等重大问题也关系极大；而且，总结这次开放与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当前的开放与改革也不无裨益。

一八六一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运动的起点，而大规模地兴办近代军用工业却是从一八六五年建立江南制造局开始的。人们对它的评论多涉及一八六一年的奕訢

^① 李达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书中说，洋务运动“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见《李达文集》第495页。

奏折。奕訢等从“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俄、英侵略，“肘腋之忧”、“肢体之患”出发，提出了“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①的主张。根据这个奏折，有人认为：洋务派在六十年代创办的一批军用工业，生产枪弹以镇压太平天国余部、捻军和各地各族群众起义，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无疑是反动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洋务运动，对它还应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首先，这个奏折在提出“灭发捻为先”时，还提出对付俄、英侵略的问题。当时，这虽然被放在次要地位，但亦不能忽视。这是阶级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而民族矛盾处于次要地位的客观反映。何况，就自强、生产枪炮以装备军队来说，军队这个国家的重要支柱，从来就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职能。这两个方面的职能，依据矛盾的主次变化，又往往有主次之分的。因此，我们在批判洋务派把镇压群众作为主要任务的罪恶时，是不能忽视洋务派也注意了对外的这个方面，只不过他们当时将其放在次要地位罢了。

其次，以自强为主的军用工业，有生产枪炮的金陵机器局，有生产轮船的福州船政局，也有以生产枪炮为主兼造轮船的江南制造局。枪炮和轮船，虽然都可以说是武器，但其用途和目的是有区别的。枪炮是为了整顿陆营，轮船主要是装备水师。当时，四川道监察御史陈廷经指出：“整顿陆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675页。

则内患不作，整顿水师则外寇不兴。”^①既然有“内患”和“外寇”的区别，我们对军用工业亦应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视为镇压群众。

再次，随着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当民族矛盾在七十年代超过阶级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的时候，军用工业虽然仍存在着对内镇压起义的性质，但其主要目的是反对外国侵略。曾国藩在一八七一年谈到“中国欲图自强”时说，“趁此内地军务将竣之际，急谋备御外侮”。并说，“仇不可忘，气不可懈，必常常有设备之实，而后一朝决裂，不致仓皇失措”^②。在洋务派创办的二十五个军用工业中，有三分之二是在七十年代后创办的。如左宗棠在一八七二年设立兰州机器局时说，“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③这主要是为西征军收复被俄国和阿古柏侵占的我国新疆领土。刘铭传于一八八五年办台湾机器局制造枪弹，是“诚以海防军火攸关，有备无患”^④。这时创建的近代海军是洋务派自强的重要内容，军用工业的集中体现。它是随着外国侵略加深而产生，是随海防局势紧张而壮大，是以外国侵略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更反映了洋务运动主要是反对外国侵略。

更次，军用工业对内除镇压群众以外，还含有为求富而

①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洋务运动》）一，第14页。

② 海防档：《福州船厂》上，第325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第41页。

④ 《洋务运动》四，第443页。

兴办民用企业的意图。如李鸿章在创办江南制造局时说，“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①。事实上，江南制造局在生产枪炮兼造轮船时，还制造了不少机器，甚至炼钢铁供应市场，起到了“机器母厂”和民用工业的作用。另如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根据“更添机器，触类旁通”认为：“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他主张新造轮船，除了以雇沙船之价运漕粮外，可“装载商货”，“听商雇，薄取其值”^②。随后，左宗棠在谈到这种主张时说，“与现设之招商局所议略同”^③。正由于洋务派创办军用工业时有兴办民用企业的思想，以及军用工业有依存和促进民用企业产生的经济规律，所以，在创办军用工业不久，在七十年代就成批地出现了不少的民用企业，使军用和民用、自强和求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更是评论军用工业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复次，军用工业的出现，是直接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相连，也是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林、魏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一八四〇年九月，林则徐就向道光皇帝提出了“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④的主张。随后，魏源将此思想提炼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⑤。左宗棠创办福州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第34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八，第2、4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一三，第41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31页。

⑤ 魏源：《海国图志》原序，第1页。

船政局，主要是由于外国侵略的加剧，目的是抵御外国侵略。他在给魏源的《海国图志》重版写序时说，“福建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①虽然，曾国藩和李鸿章与左宗棠有所不同，但是，曾国藩在谈到制炮造船时，除了“剿发捻”外，也有“勤远略”^②的一面。李鸿章在一八六三年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③，虽以对内镇压为主，亦寓有反侵略之意。他在谈到变外人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时，也有将此作为“御侮之资”^④的意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妨碍其制内。林则徐和魏源在积极主张反对外国侵略时，也参加了镇压群众的活动，我们并不因此影响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高度评价。同样，我们在对洋务派残酷镇压群众的罪行进行批判时，不能因此否认其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面，更不能以此把其思想与林、魏思想截然分开。

最后，军用工业虽然是官办，由清政府派大臣、总办等驻厂领导，资金由国家调拨，产品由政府调配，有浓厚的封建性，对外国在技术等方面有依赖性，但不能因此将其视为清政府官府官办军用工场的继续和发展，也不是早期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是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这些军用工业是用机器生产，采用近代工厂的管理方法。马克思

① 《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一，第12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第二册，第47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四，第17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第34页。

说，“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是产生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并区别于工场手工业的重要标志，而且，“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工人是招募来的领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产品在调拨时，可以选择，要偿付造价，有的还是用代造、协造、订购、出售等形式，显示了价值规律在起作用，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的性质，因而是带有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

军用工业不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是因为官僚资本的特点之一是垄断。官僚特性与封建性可以沟通，但不能与垄断等同。军用生产有其自己的特点，清政府不许民办企业生产枪炮，与从金融乃至一切经济部门的垄断为特点的垄断不同。至于后来的发展如何，那是后来的事情。洋务派引进外国技术，购买外国机器，雇用外国人员，只能说在自己缺乏技术设备情况下，对外国有依赖性，而不能视为买办性。区别依赖性与买办性的主要之点在于：这个企业属谁领导，为谁生产，替谁服务，关键在于权在何人手里。如江南制造局用了科尔等外国技术人员，负责技术工作，成了技术上的实际当家人，但经营管理大权仍掌握在李鸿章委派的总办等人手里。福州船政局任命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船政局制造、驾驶等“一切事务仍责成该两员承办”^②。但日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第66，108，127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〇，第64页。

格等人仍是奉左宗棠之命，受船政局之托，秉承船政大臣，在为中国设厂造船时，处于总包工头的地位，有总工程师职权，与船政局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雇佣承包关系，在合同期满后离职回国^①，因而不能将用洋人、洋技、洋器视为买办性。

洋务派在七十年起办的一批民用企业却与军用工业不同。这类企业有官办、官商合办，而主要的是官督商办。根据官督商办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②来看，有值得注意的几点：

首先，由官总其大纲，派总办等驻厂，对企业有督察之权，当然会给企业带来一些封建性的东西，但不能以此说是官僚资本或国家资本。因为，官只是督，而办企业是商；总办这些官，有与商无关的官，而多数却是由商当官而任总办，如有名的唐廷枢、郑官应、徐润等人就是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何况，有些官也在向商转化，即使不转化，因有商办一条，企业的大权不能说全在官手里。如唐廷枢拟订的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中选充”，并有“请免添派委员，并除去文案书差名目”^③。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由郑官应总办局务，因而织布局“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④

其次，企业的经营管理，按什么方向办事，是判断商是

① 《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二期第248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泽署函稿》卷一，第40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下册，第629页。

④ 同上书，第1043页。

否有权和企业属于何种资本的重要问题。从由商“自立条议”来看，企业章程由商拟订，“照买卖常规”办理，能反映商的利益和要求。轮船招商局还规定：每一百股举一商董，再由商董选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这说明：商有权，经营管理亦照常规办理。

再次，这些企业的资金，虽然在开办时有政府给开办费、垫款、借款等事，但这些款要付息归还，而资金主要是招集商股，是商款，不是国家资本。如轮船招商局开办时，虽借用官款十余万两，可这不是投资。因为，“名为官本，公家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①。资金是招集商股，一八七四年招股近五十万两，一八八一年招股因入股踊跃，将原来定招百万两改为二百万两。这些股金的认购者，虽有如徐润自己就认购二十多万两，但不能因他原是宝顺洋行买办，就说这是买办资本，断定企业的买办性质。因为，这时徐润已脱离宝顺洋行，资金已转化为民族资本。至于盛宣怀从八十年代开始大量购进招商局股票，亦不能因他在中日甲午战后的变化，而说这时的轮船招商局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性质。

更次，在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中，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有十年专利权。从“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设纺织”，“准照洋货已进口之例完纳子口税，概免抽厘”的规定来看，一是给织布局享受按洋货纳子口税而不交厘税的特权，对织布局的创办、特别是增强对外资的竞争，是有

^① 《交通史 航政篇》一，第269页。

重要意义的；二是郑官应奏请十年专利，主要是“以防外人争利”。李鸿章在批示中亦说，“织局乃专夺洋人之利，与华民纺织之生计渺不相涉”^①。可见十年专利着眼点在与洋人争利，不能依此断定织布局的垄断性质。当美商魏特摩于一八八二年要在上海设纺织厂时，总理衙门以十年专利拒绝，特别是左宗棠将为美商招股的王克明，借“远年旧案”，“严拿解省讯办”^②，不仅使魏特摩设纺织厂没有得逞，而且因此将外国在华设厂推迟了十余年，起到了防外人争利和保护华商的重大作用。三是十年专利有阻碍华商设厂和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可它与从金融乃至一切经济部门的垄断为特点的垄断不同。在事实上，这个规定出现后，张之洞于一八八八年在广东设纺纱厂，杨宗瀚也于一八九三年在上海集股另建同孚吉机器纺织厂。从盛宣怀重建华盛纺织总厂时，提出另在上海等地设立十个分厂，制订总纱机四十万锭和布机五千台的限额，迟至一九〇七和一九二〇年才分别达到的情况来看，它在实际上所起的阻碍作用也是有限的。这与洋务派首先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对整个民族资本主义所起的先导与促进作用比较起来，则是属于次要方面。

复次，民用企业和军用工业一样，它对外国技术和机器设备等方面有依赖性，而不是买办性。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不仅适应经济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而且

① 《洋务运动》七，第484—485，487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第16页。

是由于外国侵略，利源外流，为“敌洋产而保利源”^①，是作为外国侵略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仅就李鸿章来说，他兴办轮船招商局，是“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②；开平煤矿的开采，亦是为了使中国兵、商轮船和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外泄”^③；上海机器织布局，亦是“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④。民用企业在实际上也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如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就改变了英、美轮船公司独霸中国航运的局面，“以有力的竞争与西人企业相抗衡，使这几家英、美企业经营无利而处于窘境”。一八七七年归并美国旗昌洋行后，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订立齐价合同，轮船招商局虽未坚持三分之二的份额，作了某些不利的让步，但并非妥协，也非投降，而是相互让步和竞争的产物，更是一种斗争形式。轮船招商局也从中得到好处，从而在一八八三年的第二次齐价合同中“占了上风”，使怡和的股东承认：招商局“所占有的强有力的地位”^⑤。招商局在一八七三到一八九三年间，水运费收入每年一、二百万两，总数达三千三百四十万两，从而少入洋商之手者约三千万两。它如炼铁和织布两项，据薛福成记载，“每岁中国之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〇，第21页。

② 《洋务运动》六，第6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〇，第41页。

④ 《洋务运动》七，第453页。

⑤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第24，36页。

银少漏入外洋者不下四、五千万两”^①。

总之，从上述领导、经营管理、资金和其对内、对外关系来看，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是商办，照买卖常规经营，资金是商款，不是国家资本，对内不能说是垄断，对外亦非买办性，因而民用企业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又不是官僚资本主义，而是民族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在实质上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化运动，是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开放与改革，引起了多方面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济方面，洋务派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购买机器设备，雇佣工程技术人员，创办了二十五个军用工业，兴办了三十个民用企业。这些企业是采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是中国最先创建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的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先例，也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了与封建主义经济相对立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文化教育方面。从一八六二年设立的北京同文馆、特别是一八六六年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福州船政局设“求是堂艺局”以来，到一八九四年已先后设立各类学堂二十五所，成为我国学习西方语言、自然科学、军事科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新型学校，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教育根本变化的开始，亦是改变以往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起点。从此，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蔚然成风。在此基础上，洋务派多次有

^① 《洋务运动》七，第309页。